

把楚简《恒先》与八股文联系起来,多多少少有标新立异之嫌——楚简《恒先》是出土于战国楚地的竹简文献,现藏上海博物馆。八股文是明代科举考试的应试文体,两者的时代相距千年。难道八股文的起源能追溯到千年以前的战国时代?我们今天要从楚简《恒先》的辞章特色、八股文的文体特点,来讨论这个重要而有趣的问题。

一、从楚简《恒先》谈起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不仅关系到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战国时期的辞章文体,而且关系到我们应该如何整理、复原中国古代的简帛文献。

我们先从《文史通义》中的一个观点来看第一个问题。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反复强调:“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成国而后世之文体备”。他的意思很清楚:到了战国时代,文章的辞章变化已经穷尽,后世的各种文体也已具备。这当然是语带夸张的概活性评述,但它的观点是明确的,也就是说到了战国时代,文章写作的辞章修辞已经极尽变化,后世文章的主要文体至少已具备雏形。从上博楚简《恒先》的修辞特征来看,名噪后世的八股文文体,在文体特征上,确实可以溯源至战国。

上博《恒先》有着丰富多样的修辞手法,其中最值得提出来讨论的,是一种基于对偶格的修辞结构——排偶。楚简《恒先》所见排偶,约有两种基本的形式,排比对偶式排偶与联句对偶式排偶。在《恒先》中,这两式排偶也有复合排偶的形式。下面我们看两个例子。

第一,排比对偶式排偶。这种排偶的基本结构是三个以上的句子构成排比句,其中,各句之间彼此对偶。两两对偶是这种排偶与一般排比句的区别。楚简《恒先》第一章有“朴,大朴。静,大静。虚,大虚。”这是一组排比句,构成这组排比的3个句子中,“朴”、“静”、“虚”3词彼此相对,“大朴”、“大静”、“大虚”各以“副词+形容词”的结构彼此相对。句中,“大”字的使用,隔字重复,是类字的修辞手法,属于类叠的一种。此例虽只有9字,但已是由3个彼此相对的对偶、类字结构所构成的排比,是一种简单的排比对偶式排偶结构。

第二联句对偶式排偶。楚简《恒先》的第五章分为两层,如上下两联,可列作下表:

第一层	详义利,出于 考采物,	作焉有事, 不作无事。	举天(下)之事,自作为事, 用以不可廢也。
(上联)			
第二层	凡言名先者有疑妄, 言之后者校比焉。		举天下之名,虚树(为名), 习以不可改也。
(下联)			

上表中,括号里的“下”、“为名”诸字,是为了便于说明辞章结构而补出的。在上表第一层,“详义利,考采物”是严格工整的对偶句,“作焉有事,不作无事”是句式相对、意义相反的对比句。第二层的“言名先者有疑妄,言之后者校比焉”,也是句式相近、相对的对比句。第一层中的“举天(下)之事,自作为事,用以不可废也”,与第二层中的“举天下之名,虚树(为名),习以不可改也”,构成为对偶。整个第五章由上、下两联组成,上联中“详义利,考采物,出于作,作焉有事,不作无事”与下联中的“凡言名先者有疑妄,言之后者校比焉”,相对;上联中的“举天(下)之事,自作为事,用以不可废也”与下联中的“举天下之名,虚树(为名),习以不可改也”,相对。这样的上下两联句式双行,彼此对偶,是排偶的常见形式。《恒先》第五章的联句对偶式排偶,是一个对偶之中又有对偶、对比的复式结构。

《恒先》的这种修辞特征,不能不使我们想到以排偶为主要辞章特点的著名文体——八股文。

二、是非非八股文

八股文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臭名昭著的文体了。1942年2月,毛主席发表了《反对党八股》,把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八股文比为“又臭又长的懒婆娘的裹脚”,把反对八股文称作是五四运动的一个极大的功绩”。八股文长期以来被视作“科举中最为‘丑陋’的部分”,学者们甚至在从正面考察八股文的积极意义时,也不会忘记说明要抛弃八股文的旧形式。

然而,细读《反对党八股》,我们发现毛主席所反对的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八股文,并不是所有的八股文。实际上,在古人眼中,八股文是一种风格各异的文体,取历代骈、散之精华,甚至可与唐诗、宋词齐名。焦循《易余箭录》:“有明二百七十年,魏晋心刻骨于八股……洵可继楚骚、汉唐诗、宋词、元曲,以立一门户。”焦循还计划编一部文集,以反映“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自《楚辞》之下,汉代专录汉赋,魏晋六朝专录五言诗,唐代专录律诗,宋代专录宋词,元代专录元曲,明代则专录八股文。即便是反理学、反儒家礼义之“伤情”的公安三袁,他们也认为八股文可以抒发性灵、得文字

三昧。袁中道的《成元岳文序》说:“时文虽云小技,要亦有抒自性灵、不由闻见者。古人云:‘一从自己胸臆中流出,自然盖天地’,真得文字三昧,盖剪彩作花与出水芙蓉,一见即知,不待摸索也。”“时文”就是八股文。袁宏道在为一部八股文集作序时,更是把八股文比之于诗,认为八股文和古诗文一样,可以传之后世而不朽。

八股文的名称有多种,如八比、时文、时艺、制艺、制义、经义、举业、四书文或五经文等。八股文在形式上要求有“八股”或“八比”;“股”或“比”,都是指对偶。“八股”或“八比”,说的是在明代科举考试所独有的这种应试文体中,须有8组对偶。这8组对偶,以排偶为体,在八股文的起承转合中,有着不同的作用。

《明史·选举志》对八股文作有说明:“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古代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这一段文字,从八股文的用途、来源、人称、文体、名称几个方面,界定了八股文。1、八股文的用途:在唐、宋以来的科举考试中,用来命题试士的文体;2、八股文的来源:宋代王安石所创的应试文体经义;3、八股文的人称:以古人语气,代圣贤立言;4、八股文的文体:文章在规定的部分须句式相对,体用排偶;5、八股文的名称:八股、制义等。

下面,我们把战国楚简《恒先》的释文,按明代八股文行文的起承转合之例,简析如下,看看《恒先》的行文与后世的八股文究竟有怎样的联系。“恒先”的篇题,是楚简《恒先》的自题。全篇从“恒先无有”开始,引出“或作”(或即是恒),层层深入,大致可分如下几个层次:

1. 恒先无有,朴,静,虚。

破题:虽然篇名“恒先”应该是出自篇首的“恒先”二字,但全篇以“恒先无有”开篇,在形式上也是明破主题,下启全篇。

2. 朴,大朴。静,大静。虚,大虚。

承题:这3句每句3字,但两两对偶,排比成文,以一个排比对偶式排偶格,承题而论,说明前文的“恒先无有,朴,静,虚”。

3. 自厌不自切,或作。有或焉有气,有气焉有有,有有焉有始,有始焉有往者。

起讲:这一节分两层,“自厌不自切,或作”是第一层,描述“或”(即“恒”)的始作;“有或焉有气”等4句是第二层,以两两对偶、排比成文的排比对偶式排偶,浑写了一个宇宙发生论,钻入全篇议论的主线,开启全篇论述。

4. 未有天地,未有作行出生。

起比:这两句句式相同,虽字数互异,但成份相对;尽管对偶(“比”)不严整,但也可视作下文论述部分若干组对偶结构的起点,所以是“起比”。

5. 虚静为一,若寂寂梦梦,静同而昧或萌。昧或滋生,气塞自生。恒莫生气,气塞自生自作。

虚静为一,若寂寂梦梦,静同而昧或萌。昧或滋生,气塞自生。恒莫生气,气塞自生自作。恒气之生,不独有与也。或,恒焉。生或者,同焉。昏昏不宁,求其所生。异生异,归生归,违生非,非生违,依生依。

求欲自复。复,生之生行。浊气生地,清气生天,气信神载,云云相生,信盈天地。同出而异生,因生其所欲。业业天地,纷纷而多采物。先者有善,有治无乱。有人焉有不善,出於人。先有中,焉有大。先有柔,焉有刚。先有圆,焉有方。先有晦,焉有明。先有短,焉有长。

天道既载,唯一以犹一唯复以犹复。恒,气之生,因复其所欲。明天行,唯复以不废。知几而无思不天。有出于或,性出于有;意出于言,言出于干言,事出于干名。或非或,无谓或。有非有,无谓有。性非性,无谓性。意非意,无谓意。言非言,无谓言。名非名,无谓名。事非事,无谓事。

中比:这是楚简《恒先》的主体与全篇的重点,是一个大型的复合排比结构。在意义上,“昧或萌”与“求欲自复”、“天道既载”成份相对,“昧或滋生,气塞自生”与“浊气生地,清气生天”、“唯一以犹一,唯复以犹复”成份相对;在修辞上,“恒,气之生,不独有与也”与“同出而异生,因生其所欲”、“恒气之生,不独有与也”与“因复其所欲”排比,相对;“昏昏不宁,求其所生”与“业业天地,纷纷而多采物”、“明天行,唯复以不废”排比,相对,而“异生异,归生归”、“先有中,焉有外”与“有出干或,性出于有”等3组排比句,是一个结构严密的内含排比与对偶的复合排比对偶式排偶格。

6. 详义利,考采物,出于作,作焉有事,不作无事。举天之事,自作为事,用以不可废也。凡言名先者有疑妄,言之后者校比焉。举天下之名,虚树(为名),习以不可改也。

后比如表所示,这是联句对偶式排偶,发中比所未发。

7. 举天下之作,强者果天下之大作。其,龙不自若作,若作,庸有果与不果;两者不废。举天下之为也,无接也,无与也,而能自为也。举天下之生,同也,其事无不复。

8. 天下之作也,无忤极,无非其所。举天下之作也,无不得其极而果遂。庸或得之?庸或失之?举天下之名,无有废者欤?天下之明王,明君、明士,庸有求而不虑?

大结:用句式相近的陈述句与问句组,发挥已意,收结全篇。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8个层次,是从文体结构与辞章学分析的角度,对战国楚简《恒先》与“八股”或“八比”所作的比较。我们并不是说《恒先》就是八股文,而是说战国楚简《恒先》的文体与修辞特征,与明代八股文已经惊人地相似,“八股文”的文体已备于战国。此外,以上的分层讨论,仅适用于特定的文体辞章学分析,并不是《恒先》的分章方案。

综上所述,广义的“八股文”作为一种具备某种特定辞章特点的文体,已经滥觞于战国,但这并不是说后世八股文这一狭义的、特定的应试文体始于战国。战国楚简《恒先》的发现与研究告诉我们,古人认为后世文体皆备于战国,绝非无稽之谈;从文体辞章学的角度去考察出土简帛,一定会有更多重要的新发现,应该成为中国简帛学的一个研究对象。楚简《恒先》与八股文的关系分析,验证了我们提出的楚简《恒先》分章方案的合理性。这一研究表明,从出土简帛内在的文献结构与修辞特征入手,是我们整理、复原出土文献的重要方法。

(作者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兼职教授、美国Dartmouth College副教授)

國學

2010年第8期

总第152期

责任编辑 梁枢 柳莹

电话:010-67078963

电子信箱:liangshu1950@163.com

“安身立命”作为一个成语,出自禅宗。在《景德传灯录》卷十上,有这样的记载:僧问:“学人不据地时如何?”师云:“汝向什么处安身立命?”可是“安身立命”作为一种学理,则出自儒家。孔子在《论语》中,已谈到“安”。宰我覺得守喪三年似乎太長了,主張縮短一些。孔子很嚴地批評了他,申斥宰我“不仁”。孔子認為,喪禮之所以規定守喪三年,理由就在於一個“安”字。“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孔子所说的“安”,指的是情感的安顿、精神的安顿,這是儒家讲安身立命之道的滥觞。《论语》也谈到“身”。《学而》篇写道:“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在这里,“身”指的是人的行为践履,把精神安顿与生活实践联系在一起。关于“立”,孔子的说法是“三十而立”(《为政》),就是确立人生的价值取向。关于“命”,孔子的说法是“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这里所说的“命”,指的是君子应有的使命感。

在《论语》中,已分别论及安、身、立、命,但还只是一些初步的想法。到孟子这里,则形成了儒家关于安身立命之道的比较系统的说法。孟子把人性善视为安身立命之道的内在依据,而“天道诚”则是他为安身立命之道指出的超越指向。他说:“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离娄上》)所谓“思诚”,就是以“天”作为终极的价值目标,扮演好天民的角色,力求进

儒家安身立命之道

宋志明

入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至于进入天人合一精神境界的路径,孟子不可能选择外求的认识路线,只能选择内求的心性修养路线,他称之为“求放心”。他指出,现实的人之所以流于不善,并非人的本心所致,而是人不肯下功夫寻回业已失掉的本心。他慨叹:连自己家的鸡犬丢失了,知道找回来;可是自己的本心丢失了,却不知道找回来,真是一种悲哀!他对这种人的忠告是:“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

宋明理学家吸收了中国佛教哲学和道教哲学的理论思维成果,创立了儒学的新形态。他们十分重视儒家的安身立命之道,对它做出深刻的阐发,使之在学理上臻于成熟。他们倡导的“孔颜之乐”、“圣人气象”、“常惺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复尽天理”、“发明本心”、“致良知”,都是关于儒家安身立命之道的具体说法。经过理学家的阐发,儒学不但可以治国,还可以治身和治心。

人们寻找精神生活方式,可以选择外在的路向,也可以选择内在的路向。如果选择外在的路向,会形成宗教的精神生活方式,把超越的目标定位在彼岸世界。这种精神生活方式通常会否定人生的价值,如基督教有原罪说,佛教也有“人生是苦”的说法。按照外在超越的路向,人无法自己实现超越,必须靠救世主或佛来拯救。儒家所选择的是内在超越的路向,找到了一种哲学的精神生活方式,这就是安身立命之道。所谓“安身”,就是从内在性出发,肯定人性中具有崇高价值,肯定人具有自我完善的内在根据。用传统的说法,就是“人性善”,就是“人为贵”。这个“身”字很要紧,表明人的精神世界不可能脱离人的生活世界。所谓“立命”,就是主张追求理想人格,追求精神上的超越,追求境界上的提升。用传统的说法,就是“超凡入圣”,成就理想人格。这种内在超越,完全靠自己努力,“我欲仁斯仁至矣”,不必指望外力的拯救。儒家的安身立命之道,建立在“一个世界”的基础上,没有设置彼岸世界。儒家认为,在现实的人生实践中就可以达到超越的目标,不必企望彼岸世界,也不必寄希望于来世。

儒家的安身立命之道具有包容性,可以同人们的其他信念相兼容。一个人认同儒家的安身立命之道,并不妨碍他接受任何宗教信仰,也不妨碍他接受任何政治理念。只要这些信念有助于人格的自我完善,儒者都会表示充分的尊重。儒家的安身立命之道可以实行现代转化,可以成为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资源。精神文明程度固然同物质文明程度有关系,但不会随着物质文明的提高而自然而然地提高,需要人们有意识地去“建设”。如果忽略了精神文明的建设,人们的物质世界将会坍塌,物质文明也将随之失掉价值。

國學漫談

战国文学研究的理论前提 ——读《战国文学史论》

陈桐生

就为全书的论述确定了一个比较严谨且符合战国文学实际的理论前提。《战国文学史论》的理论成就还体现在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方面,作者将其方法概括为八条:充分地占有并鉴别原始材料;全面检讨此前的研究成果,力求折衷务实;重点探讨战国文学作品的思想艺术;关注战国文学的人文环境、时代精神和个性;注意挖掘战国文学的历史根源及影响;以研究战国主流文学及其主流特征为目的;在注重传世文献的同时重视出土文献;重视文学断代史的整体研究。这些研究方法既继承了中国古代朴学的实事求是优良传统,又吸收了近代以来形成的二重证据法等精华,还体现了归纳法等现代科学方法。工

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为《战国文学史论》的成功著述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保证。

中外比较是《战国文学史论》的又一亮点。作者在1996年出版的《战国文学史论》中,就尝试运用比较方法,但遭到有些人的批评,因为这毕竟不是文学史的通常写法。但是,在文学史论中进行比较,就是无可指摘的了。作者在界定战国文学学科内涵的时候,便以欧洲文学发展的历史性特征作为参照系,说明战国文学有它的特定内涵,不能拿一个普遍性的文学概念来进行限定,而要从战国文学的实际出发,这样才能给予实事求是的批评。在对战国文学进行全面探讨之后,作者又一次将战国文学与欧洲浪漫运动做了比较,认为战国文学在很多方面与欧洲浪漫运动有相似之处,诸如反对权威、蔑视传统和古典模式,主张个人主义、尊重个性、热衷于描写自然,强调主观感情的抒发,具有丰富的想象力、鲜明的色彩、异常的情节和大胆的夸张,学习民间文学,反对专制向往民主,具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神秘主义、无道德、无政府主义、悲观主义倾向,追求人的自由,否定理性和科学等等。通过这些比较,读者可以在广阔的视野之内更好地把握战国文学的基本特征。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